

青橄榄文丛(第二辑)

樊星 著

世纪末文化思潮史



湖北教育出版社

青橄榄文丛(第二辑)



世纪末文化思潮史

隍 星 著

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文化思潮史/樊星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青橄榄文丛/王先需主编)

ISBN 7-5351-2512-3

I. 世… II. 樊… III. 现代文化-社会思潮-研究-中国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2860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电话:8544373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437100·咸宁市温泉路41号)

开本:850mm×1168mm 1/32

4插页 9.75印张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8千字

印数:1-3 000

ISBN 7-5351-2512-3/G·2055

定价:16.50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写我们的当代史(代序).....	(1)
第一章 思想解放的先声	(14)
第一节 热血叛逆者	(17)
第二节 红卫兵的绝望与叛逆	(26)
第三节 知青的叛逆之路	(34)
第四节 “四五运动”的狂飙	(42)
第五节 “地下文学”的潜流	(46)
第二章 新时期的呐喊	(55)
第一节 思想解放的春雷	(55)
第二节 “拨乱反正”的大潮	(62)
第三节 文学:重返五四.....	(72)
第四节 “人道美术”的证明	(81)
第五节 人生意义大讨论	(87)
第六节 李泽厚现象	(94)
第七节 “丛书热”与青年学者群体的崛起.....	(105)
第三章 浮躁岁月的喧哗	(109)
第一节 “世纪末情绪”的滥觞.....	(110)
第二节 “改革题材文学”是怎样衰落的.....	(116)
第三节 文化危机的哀号.....	(120)
第四节 “新生代”的崛起.....	(138)
第五节 1986:焦灼之年	(153)
第六节 “生存危机”的警报.....	(176)
第七节 “中国问题学”的诞生.....	(180)

第四章 寻找方舟	(187)
第一节 寻找“新感觉”	(188)
1. 溯源“知青文化”	(188)
2. 什么是“新感觉”?	(192)
3. “台港风”的流行.....	(196)
4. “新道家”的崛起.....	(199)
5. “神秘文化热”.....	(209)
6. “潇洒”种种.....	(215)
7. “王朔现象”批判.....	(228)
第二节 守护“新理性”	(233)
1. 什么是“新理性”?	(233)
2. 五四精神的回归	(239)
3. 知识分子的再觉悟	(252)
第三节 走向“新宗教”	(261)
1. 什么是“新宗教”?	(261)
2. “新宗教”的历程.....	(264)
第四节 多元抉择的困惑	(273)
附 录 90 年代的思想裂变	(281)
后 记	(302)
补 记	(304)

写我们的当代史(代序)

——

是时候了。当我们一步步走近 20 世纪的终点时，一种强大的历史感便渐渐充满了我们的心胸。蓦然回首，我们不仅对祖国走向现代化的坎坷历程百感交集，对这颗小小寰球在百年内的风云变幻百感交集，更对我们当代人所亲身经历的狂热与疲倦、迷惘与觉悟、焦灼与悲凉百感交集，心潮难平。如果真如老黑格尔所言，在冥冥之中有狡黠的理性在播弄着人的命运，那末，回首我们亲历过的往事，我们又可以从狡黠的理性那儿获取怎样的启迪呢？

是时候了。写一本我们的当代史。

我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身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每一个人都无法超越时代。然而，因此就随波逐浪，而把所谓“公正的结论”推给遥遥无期的未来？回眸历史的云烟，当我们目睹历史的真面目竟在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重新认识、重新发现、重新评说中变幻无穷，并且惟因其变幻

无穷才焕发出永远诱人的魅力时,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有我们的局限性。同时,我们也有后来人不可能拥有的优长:我们和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早已水乳交融、血肉相联,那份亲切感,那份由这亲切感产生出来的现实感、责任感,后人永远也不会有。而当我们发现,我们所亲历的一切对于“文革”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已变得那么遥远、那么神秘、那么不可思议时,当我们意识到巨变中的社会正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度奔向未来,同时也把我们所亲历的一切都抛入时间的忘川之中时,一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便驱使我们拿起了写我们的当代史的笔,把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许多不应被遗忘的事都记下来,既是为了不在历史上留下一段不应有的空白,也是为了给这一代人树立一个路标——诚如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所言:“人是什么,只有他的历史才会讲清楚。”^①

二

事实上,已经有人在致力于当代史的研究,并作出了可贵的成绩。1986年高皋等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1991年,高名潞等著《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问世;1992年,火木著《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面世……这些史书都在当代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占有极其可贵的地位。它们标志着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一个高度。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它们并未引起史学界应有的重视。尽管早在1988年,史学家瞿林东就在《展望下一个十年的史学》一文中呼吁:“研究当代史,为当代而研究历史,应成为史学发展中的主要潮流。”^②

① 《梦》,见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② 瞿林东:《展望下一个十年的史学》,《光明日报》1988年5月4日。

也是在1988年,笔者在《书林》杂志2月号上发表了《写我们的当代史》一文,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于“时代心态”、“精神史”、“思想史”、“心史”。1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经过这些年的搜求与琢磨,终于有了总题为《“当代思想史”片断》的系列论文^①,有了这本书,这本《世纪末文化思潮史》。

我要写一部心灵的历史,一部时代情绪变迁的历史。因此,我无意写一部思想家的历史。在关注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我注意到法国“新史学”关于“总体历史”(“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②,关于“将历史看做是整个生命的复活……观念、习俗及民族精神的内在的伟大的进步运动”^③,关于“恢复哲学反思命题的历史学”^④等一系列精彩的思想。这些思想与我早几年便一见如故的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有关“历史过程就是一个思想过程……它就是心灵生活的本身”^⑤的思想一起,成为我研究当代史的理论基石。历史,是由无数活生生的人一起共同创造的。在历史事件的深处,是人的欲望和热情在熊熊燃烧,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排列组合。我在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美国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的著作《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

① 《这一代人的牺牲意识》、《这一代人的分化》见《文艺评论》1993年第3期、第6期;《世纪末的流浪与求索》见《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1期;《从呐喊到冷嘲》、《新生代的崛起》、《“57族”的命运》、《“文革”记忆》、《当代新道家》、《世纪末的文化漩流》、《“五四情结”与当代思想》分别见《文艺评论》1994年第6期,1995年第1期、第2期,1996年第1期、第2期、第5期,1997年第1期;《“知青族”的旗帜》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6期;《90年代的思想裂变》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③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见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第22页。

④ 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见J·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

⑤ R·G·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

化》那儿找到了写心灵史、情绪史、精神史的楷模。思想的高峰也许是难以逾越的,而我的奢望也仅仅在于:通过对纷纭复杂的众多文化现象的归纳与梳理,勾勒一幅世纪末心灵巨变的草图。当然,我不会止于材料的罗列。我想为我眼中的当代史镀一层思想的光芒。写世纪末的心史,同时也意味着写我对世纪末沧桑之变的理解。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尤其因为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对思想之花的摧残,中国当代的思想家园地里,长期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中国思想界迄今缺乏世界级的思想大家,缺乏风云际会的思想学派,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当我们进一步发现:19世纪后半叶以来,大部分文化人都纷纷走上去西天取经之路时,我们又怎能不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凉呢?

然而,思想家历史上的空白并不等于一个民族、几代人心灵的空白。仅仅“文革”以来这20多年的风雨历程,便有多少文化史、心灵史研究的课题值得大做特做!

我的本行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我注意到:在缺乏思想家的时代,文学家常常便担负起了思想家的使命。鲁迅之所以能成为30年代的“民族魂”,不就因为他不懈地致力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①的写作以推动“思想革命”^②的功绩么?19世纪的俄国,也是由一批文学家承担起了思想家的重任。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社会自由的人民,有了文学——这惟一的讲坛,他们就能从这个讲坛上听到自己愤怒的和发自内心的呼号。”“在这样的社会里,文学的影响达到了欧洲其他国家早已消失了的那种规模。”^③一部《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竟辑录的全是那些文学家的思想,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

① 《两地书·一七》,《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② 《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③ 《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见《文艺论丛》第19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夫等人因此也在俄国思想史上占了极为显著的地位。而罗素不也在《西方哲学史》中给卢梭、拜伦这两位文学家给予了特殊的评价么？罗素写道：“有些人——例如卢梭和拜伦——虽然在学术的意义上完全不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们却是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至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的发展。”^① 卢梭“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是从人的情感来推断人类范围以外的事实这派思想体系的创始者”^②，而拜伦的意义则在于：他愤世嫉俗，是绝望中抗争的一面旗帜，因此，罗素把他“当做一种力量，当做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或理智见解的变化原因来考察”。还有关于尼采的评论：这是一位“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之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③ 罗素的哲学史之所以写得独具风采，与他这种开阔的视野、哲人的目光很有关系。由此，我得到了宝贵的启迪：在缺乏思想家的时代，可以通过对文学思潮和思想型文学家的研究来窥视时代心态的奥秘。我相信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揭示的一条真理：“一个国家的文学，只要它是完整的，便可以表现这个国家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般历史。如英国或法国那样伟大的文学，便保存了无数的证据，可以用来推断这个国家在各个历史的时期里如何思想和如何感觉。”^④ 对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亦可作如是观。

从文学思潮的流变中把握心态变迁的脉搏，是心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又想使自己的目光更开阔些，从文学以外的某些重大社会事件和某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中获取心灵史研究的资料。前者如“红卫兵运动”、“知青大逃亡”，后者如“星星美展”、“摇

① 见该书《美国版序言》，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5 页。

② 《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25 页。

③ 《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95、311 页。

④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伍蠡甫等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72 页。

滚乐狂潮”。我感到，世纪末的心态变迁是一场全方位的巨变：从生活方式的巨变到价值观念的巨变，从文化精英的巨变到平民百姓的巨变。我力图通过对某些重大社会事件和重要文化现象的评述尽可能在一个较为开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展示心灵史变迁的壮丽图景。

三

确认了我的心灵史的写作坐标以后，最后的理论问题便是找到提纲挈领的线索。只有把握住理论的纲，才有可能避免将完整的历史处理为一堆支离破碎的史料堆积。历史事件纷纭复杂，云诡波谲，而历史发展中显示的理性则是纵览云飞的制高点。心灵史的任务便在于寻找潜藏在历史事件深处的历史意志、理性意志。

谈及 20 世纪的中国巨变，许多学者都指出了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文化背景，由此产生了许多理论话题：关于现代化与中国特色，关于改造国民性，关于比较文化、比较哲学、比较文学等等。研究心灵史，也必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不过，心灵史研究还可以寻找新的理论模式。

心灵史研究，是对于时代精神变迁历程的研究。如果说，走向现代化是 1840 年以来中国巨变的基本主题，那末，当这一进程在 20 世纪由于战乱和政治运动的干扰而几度中断时，在特殊的历史时段里，又产生了怎样的时代精神？具体说来，这本书所要研究的“文革”以来的世纪末心灵史历程中，产生了怎样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又是如何因为各种偶然因素的交叉作用而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变的？

让我们来简略地回顾一下历史。

“文革”是一场浩劫。它起源于权力斗争，又借着乌托邦的幻想和现代迷信的效应而达到巅峰状态。它原来的目标只是摧毁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却不曾想也阴差阳错地摧毁了无数人的纯

洁信仰,引发了一场深刻的“信仰危机”。千百万人从狂热到迷惘,只在弹指一挥间。许多人看破了红尘,将“难得糊涂”作为处世的座右铭;也有许多人在危机中猛醒,走上了新的求索之路。从这个角度看,“文革”既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如果说冥冥之中真有一个“绝对精神”在引导着人类,那末我们完全不妨设想:“文革”这场大悲剧、大喜剧似乎是“理性的狡黠”的又一个杰作。“绝对精神”把“文革”变成了一堂唤醒中华民族走出乌托邦的迷梦,继续中断了的走向现代文明伟大进程的启蒙课。从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文革”为新时期作了起码的心理铺垫。

新时期始于一场不流血的较量。始于一次拨乱反正的大会。始于一场思想启蒙的大论战。70年代末的这场巨变导致了一场空前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导致了世纪末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大变革。同时,现代化也在迫使步履蹒跚的中国付出某些巨大的代价,例如文化低谷问题、物价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和体制改革问题等等。“理性的狡黠”再一次捉弄了天真的浮躁情绪,同时也使世纪末的悲凉之雾弥漫开来。

在相继走出了政治的乌托邦之梦和经济的乌托邦之梦以后,民族才找到了务实的立足点,但由一连串天翻地覆的巨变引发的心理失衡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合理的调节。浮躁是20世纪中国的主题情绪,是20世纪的中国人上下求索、焦灼不宁的心态体现。在世纪初到世纪中叶长达近80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寻找理想的政治制度而焦灼不宁;到了世纪末,人们又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为找寻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浮躁不安。

基于上述认识,我感到可以将世纪末心史写成一部世纪末的中国人走出乌托邦幻梦以后“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的精神历程。而“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便成为世纪末心史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萌生于“文革”之中,兴盛于“文革”之后的新时期,并将一直延伸到未来的21世纪。

天气有晴有阴,草木有枯有荣,时代大潮有涨有落,人的心绪也时喜时忧。因此,心灵史也理应着眼于时代精神的变迁和人们情绪的起伏。回首 20 多年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注意到时代精神的几度巨变和国人心潮的几度涨落:

从“文革”发动的 1966 年到知识青年大批下乡的 1968~1969 年,是人们受骗上当、疯狂追求乌托邦迷梦的迷狂期。因现代迷信而急剧亢奋的情绪在大批判、大破坏、大内战中登峰造极,但亢奋到了极点便不可避免要跌入疲惫的低谷。尤其当“红卫兵运动”落得个兔死狗烹的结果,不仅没在权力再分配中分得一杯羹,反而被放逐到农村时,疲惫的心绪又与不满、怀疑的情绪汇在了一起。“世纪末情绪”在“文革”由盛而衰的转折中开始滋长。

这便是世纪末心潮的第一度涨落。

从 1969 年“九大”召开、林彪被法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举国欢庆到 1971 年林彪出逃、折戟沉沙、举国共讨之引发的强烈精神危机,是人们幡然猛醒、冷眼看破“文革”闹剧的觉悟期。“林彪事件”成为“文革”大骗局的绝妙象征。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艰难困苦,以及意识到受骗上当后产生的愤怒情绪如地火开始在悄悄运行。作为叛逆情绪典型象征的“地下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流行开来的。“地下文学”标志着“世纪末情绪”已成气候。“文革”的丧钟从此敲响。

这是世纪末心潮的第二度涨落。

从 1976 年的“四五运动”到 1979 年的“知青大逃亡”,是火山喷发、人们以自发的反抗宣泄不满、争取自由的抗争期。抗争的结果,“四五运动”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却终于能在新时期开始后的 1978 年获得了平反昭雪;而“知青大逃亡”则几经磨难,大获成功,只是这成功也浸透了苦涩的泪水——“大逃亡”的成功毕竟不能挽回千百万普通知青被虚掷了的青春。“四五运动”的平反和“知青大逃亡”的成功是民意不可侮的证明,是民众开始走向自己把握住自

己的命运里程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四五运动”的抗争还显示为一种不可排解的政治情结,那末,“知青大逃亡”的抗争则带有相当浓厚的自救色彩,是一代人在无偿奉献了青春作现代迷信的祭礼之后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和独立人格而斗争的现代意识的显现。不过,时代需要安定团结。当改革的旗手将国家引上了和平建设的航道时,抗争的亢奋也就自然会消隐在历史的潜流之中了。80年代初改革的乘风破浪、捷报频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民众心灵的创伤。

这是世纪末心潮的第三度涨落。

1985年被公认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个转折点。改革深化中遇到的重重困难为浮躁心绪的蔓延创造了条件。多元文化、多元价值体系的碰撞激发了新的忧患意识。文学成就了空前的繁荣又为浮躁的情绪推波助澜。理性的呼声终于不敌浮躁的喧哗。“新生代”以惊人的气势登上了历史舞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文化狂潮。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动的集团冲锋既加速了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又使“世纪末情绪”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这股思潮在1989年以后也极流行,王朔小说、崔健摇滚乐、张元电影是其典型象征。

这是世纪末心潮的第四度高涨。这股非理性的文化大潮似乎将会一直流向下一个世纪。它是狂躁的,又是飘忽无定的;是率真的,又颇有些矫情;是放浪不羁的,又充满了无家可归的悲凉。这是一个宣泄苦闷不怕惊世骇俗的时期。

以上,便是对我眼中的世纪末心态消长的一个大略勾勒。下面的问题是:在世纪末心潮的演进史中,我们会得到怎样的启迪呢?

首先,我想说,浮躁是青春的主题。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文明史使它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一个老者的角色。它的黄金时代似乎早留在汉唐时代的记忆中了。它在近代的衰落有目共睹。依照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说法,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一种有机体,而任何有机体都有其命定的、无法超越的生命周期。“每一

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①历史上曾有过多少文明死亡的悲剧！因为战乱，因为天灾，因为一些后人无法知晓的隐秘。尽管宿命论者斯宾格勒也说过：“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②但当我们目睹了这“新的可能”对于当今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只是以“西化”作代价才得以实现时，当我们得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将“保护文化”与“发展经济”并列为当今世界两大亟待解决的难题时，我们不难明白：“西化”的“新的可能”其实不过是古老文明已无可挽回地衰落的进一步证明罢了。当代的选择是：要么拒绝现代化，要么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与西方文化接轨。古老中国文化在 19 至 20 世纪的巨变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一代又一代“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人们走向西方，从西方引来现代化的火种，点燃故国的现代之火。然而，中国毕竟是中国：它在回应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尽管一再错失良机，却总能在猛醒之际急起直追，创造文化的奇迹——30 年代的上海、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和香港、80 年代的中国大陆都是明证。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是：青年，充满活力的青年，一直是 100 多年来推动中国社会巨变的强大生力军。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文革”中的叛逆者（“四五”一代人），新时期的弄潮儿……都是青年。一代一代的青年以青春的活力和新思想为古老民族的文化更新注入了不断的生机，使古老的民族在浮躁的情绪中蜕变。因此，当我们用“浮躁”两字作 20 世纪中国情绪的总体概括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以青年文化作 20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尽管青年文化在实际发展中难免受到其他文化因素的制约而

① 《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9 页。着重号原有。

② 《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39 页。

呈现出时断时续、时涨时落的形态,尽管青年文化本身也具有多元、多变、不断分化的性质,很难一概而论,但 20 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几个高潮均由青年的激情谱成,却是不争的事实。20 世纪中国的巨变之所以远较以前任何一个世纪为巨、为烈,也明显与青年文化思潮在 20 世纪终于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潮有很大关系。当年,梁任公激扬文字,写成慷慨激昂、雄视千古的《少年中国说》,力倡“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①。这篇写于上个世纪末的雄文,今天读来,竟如预言一般展望了 20 世纪青年运动的兴旺发达!基于这种认识,我的世纪末心史理应写成一部以青年文化为主潮的发展史。

其次,我感到,中国在 20 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不仅仅是一个从贫穷走向小康的历程,也是一个从“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②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下的多元文化范式转型的历程。在传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长期熏陶下,“政治情结”成了 20 世纪文化心态的一个主要情结。20 世纪的风云大都为政治风云,因为 20 世纪的国人一直在为寻找一种理想的、健全的民主与法制的政治制度而奋斗。然而,“文革”大骗局却教训了民众。“文革”后期的“信仰危机”既是“世纪末情绪”的第一个浪头,又是大众的“政治情结”弱化的一个象征。到了新时期,尽管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一直得到了民众的参与与监督,但经济建设热潮的高涨、文化生活的多元化都更多地吸引了大众的兴趣,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转引自《历代文选》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38 页。

② 此取冯天瑜先生说,见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1 页。

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显然,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政治情结”的弱化从根本上削弱了政治运动恶性循环的社会心理基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又对国民性的改变、国民素质的进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创造意识、个性意识、竞争意识、危机意识作为现代意识的主要内容已融入了 80 年代的社会生活,并在青年文化的园地里开出了奇葩。当代青年在深圳、海南开发中创造的奇迹,以及“特区文学”、“留学生文学”、“文化个体户”、“自由撰稿人”等新奇事与人都只能在商品经济的天地中生长。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对传统价值观的猛烈冲击,铁的经济规律对文化事业的无情打击也势必为“世纪末情绪”的流行推波助澜。80 年代末“文化低谷”的出现,教育危机、拜金主义盛行,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均暴露出现代化进程中的负效应。当代青年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分化与蜕变,成为世纪末文化景观中最诱人的部分,因为它展示了下个世纪中国文化思潮发展的基本趋向。在本书中,我将着力研究这一部分文化景观,并进而预测青年文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最后的一点启迪是:由于世纪末的心潮有涨有落,而且这涨与落的周期随着社会的飞速变化而呈现出频繁更迭、此消彼长的规律性,因此,在世纪末的悲凉之雾弥漫之际,我仍要重复美国作家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奖金时的演讲中的一段话:“我拒绝接受人类的末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他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①心理健康的人都有良好的自我心理调节机能。生命力顽强的民族也都有凤凰涅槃的非凡活力。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多少天下大乱,再大的灾难也没有击断它的脊梁。单看看世纪末的巨变:从 60 年代的天下大乱到 70 年代末的天下大治、80 年代的经济起飞,前后不

^① 《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367—386 页。